

杨素、杨玄感父子与江左文士之交往

——从一个侧面看隋代江南文化的北传

王永平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 杨素、杨玄感父子为隋代关陇勋贵之代表。隋灭陈后, 南士北徙, 杨氏父子相继招引、交结南人, 对南北文化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究其原因, 杨素如此, 主要出于对江左文化的钦慕, 其文风显然受到了南人的影响。杨玄感与南人交往, 但主要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故为隋炀帝嫉恨。诸多南士依违杨素父子, 本想寻找新的政治靠山, 但最终遭受炀帝的严惩。

关键词: 杨素; 杨玄感; 隋炀帝; 江左文士; 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K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46(2005)05-05-06

杨素(?—606年), 据《隋书》卷四八本传, 杨素为弘农华阴人, 北周和隋朝时期关陇军政集团的核心成员。其为人, “兼文武之资”。关于其文才, 本传载: “素少落拓, 有大志, 不拘小节, ……后与安定牛弘同志好学, 研精不倦, 多所通涉。善属文, 工草隶。颇留意于风角。美须髯, 有英杰之表”。关于其武功, 周武帝时, 素助平北齐; 隋时, 杨素参预开皇九年灭陈与十年平定江南反叛的战争, 又领兵击溃突厥, 消灭汉王杨谅。隋文帝后期, 素特受宠信, 官拜尚书左仆射、封越国公。素与弟约助晋王杨广阴谋夺嫡, 炀帝嗣位, 以素为尚书令。

杨玄感(?—613年), 杨素之子, 据《隋书》卷七〇本传, 玄感“体貌雄伟, 美须髯。……及长, 好读书, 便骑射。……袭爵楚国公, 迁礼部尚书”。杨玄感有政治野心, 他于大业九年(613年)乘炀帝东征高丽, 内外交困之机, 于黎阳发动兵变, 意在推翻隋朝, 自立为天下之主。然玄感无谋, 终于失败, 满门被诛。不过, 炀帝虽然平定杨玄感之乱, 但关陇集团却由此公开分化瓦解, 敲响了隋朝灭亡的丧钟。

杨素、杨玄感父子作为周、隋之际关陇军政集团的核心人物, 其家族一度成为关中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豪门。父子二人皆重事功, 具有强烈的进取心和权势欲。有隋一代, 杨素父子卷入、甚或策划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 对当时政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素来倍受史家关注。不过, 近来笔者致力于隋唐之际南士北徙与南北文化交融问题之探讨, 翻检有关文献, 发现杨素父子与入隋南士交往颇为密切, 而且此举深刻地影响了其父子之学术文化与政治活动。但对此似尚无人论及, 有必要对杨氏父子与南士交往略加考叙, 进而从一个侧面透视入隋南士之境遇及其人生选择。

一、有关杨素与南士交往之史实及考释

检索《隋书》、《续高僧传》、《旧唐书》、《陈书》等文献, 可以考见如下几则有关杨素与江左文士交往的典型材料。

杨素与鲍亨、殷胄。《隋书》卷四八《杨素传》载:

(素)有鲍亨者, 善属文, 殷胄者, 工草隶, 并江南士人, 因高智慧没为家奴。

鲍、殷二人为江南士人, 有良好的文化修养, 参与开皇十年江南叛乱。杨素南下镇压叛乱, 得俘二人

收稿日期: 2005-05-20

作者简介: 王永平(1962—), 男, 江苏南京人,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导、历史学博士。

为家奴。二人虽为素“家奴”，但不会像一般奴仆那样从事苦役，当有机会与杨素进行有关南朝文化的交流。

关于杨素对江左文化之爱好及鲍、殷二人被俘的情况，《续高僧传》卷三〇《杂科声德篇·隋杭州灵隐山天竺寺释真观传》的记载有作为补充：

释真观，字圣达，吴郡钱塘人。……初，观声辩之雄，最称宏富，江表大国，莫敢争先。……开皇十一年，江南叛反，王师临弔，乃拒官军，羽檄竞驰，兵声逾盛。时元帅杨素，整军南驱，寻便瓦解，俘虜诛翦三十余万。以观名声昌盛，光扬江表，谓其造檄，不问将诛。既被严系，无有申雪。金陵才士鲍亨、谢瑀之徒，并被拥略，将欲斩决，来过素前。素曰：“道人当坐禅读经，何因妄许军甲，乃作檄书，罪当死不？”观曰：“道人所学，诚如公言。然观不作檄书，无辜受死。”素大怒，将檄以示：“是尔作不？”观读曰：“斯文浅陋，未能动人，观实不作，若作过此。”乃指摘五三处曰：“如此语言，何得上纸？”素既解文，信其言也。观曰：“江南草窃，出在庸人，士学儒流，多被拥逼。即数鲍、谢之徒三十余人，并是处国宾王，当世英彦，愿公再虑，不有怨辜。”……素曰：“多时被繫，巨解愁不？”素纸与之，令作《愁赋》。观揽笔如流，须臾纸尽，命且将来，更与一纸。素遂执读，惊异其文。……素大嗟赏，即坐释之，所达文士免死而为仆隶。

杨素释放真观法师及将鲍亨等三十余名士人免死为奴，主要是为了怀柔江南人士，减缓他们的抵抗情绪，并非如此段记载仅由于真观法师的文采打动杨素所致^①。不过，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杨素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特别对江左文学素颇为喜爱。

杨素与潘徽、欧阳询等。《隋书》卷七六《文学·潘徽传》载徽为吴人，善属文，博学通洽。入隋，潘徽先后依秦王杨俊、晋王杨广为学士，撰著《韵纂》、《江都集礼》等。大业之初，他与多位南人辅助杨素修史：

炀帝嗣位，诏徽与著作佐郎陆从典、太常博士褚亮、欧阳询等助越公杨素撰《魏书》，会素薨而止。

几位皆为南人，陆从典、褚亮下文将叙及，欧阳询为湘人，《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传》载其受学于陈尚书令江总，“博通经史，尤精三史”。杨素主持编撰《魏书》诸南士助之。平时其间相互交往当较密切。

杨素与陆从典。《陈书》卷三〇《陆琼传附子从典传》载从典为吴地著姓陆氏之后，以善史学而得素器重：

（从典）笃好学业，博涉群书，于班史尤所属意。……俄而金陵沦没，随例迁关右。仕隋为给事郎，兼东宫学士，又除著作佐郎。右仆射杨素奏从典续司马迁《史记》迄于隋，其书未就。

从典善文，尤长于史学。杨素推荐他撰写一部接续《史记》的通史，这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工程，惜其书未成。

贺德仁与杨素。贺德仁为越州山阴人，贺氏世代习礼，为江左礼学重镇。关于其与杨素之交往，《旧唐书》卷一九〇《文苑·贺德仁传》载：

德仁少与从兄德基俱事国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词学见称，时人语曰：“学行可师贺德基，文质彬彬贺德仁。”……入隋，仆射杨素荐之，授豫章王府记室参军。王以师礼待之，恩遇甚厚。

贺德仁学行、文词兼备，是南士之代表。杨素荐其官职，可见双方当有一定交往，素此举自然也可获得其他南士的好感。

对于杨素，人们多熟知其政治、军事作为，实际上，他还是颇有地位的文学家。《隋书》本传载其自少“善属文，工草隶”，有文集十卷。由以上所引《续高僧传·真观传》，可见杨素早自平陈前已颇了解江南文学，并有相当高的欣赏水平。杨素之诗，今存六首，其写景、抒情，颇受南朝诗风的影响，表现出“清远”、冲淡的艺术气质。对此，历代论者颇有不解，如沈德潜《古诗源》卷一四便以为“武人亦复奸雄，而

① 通过杨素与真观法师的对话，可见他对南方佛教也颇感兴趣。关于这一点，有一则更典型的材料。《续高僧传》卷一四《义解篇十·唐苏州武丘山释智琰传》：智琰，字明儵，俗姓朱，吴郡吴人，佛学修养甚好，显名梁、陈二代，然“陈氏丧鼎，便事东归，削迹武丘，将三十载。……尚书令、楚国公杨素，经经纬武，王佐国均，乘贵负才，未尝许物。行军淮海，闻琰道胜栖山，鸣铙赴陇，倾盖承颜，五体投诚，恨接足之晚。”杨素如此谦恭地对待智琰，当然主要是争取人心，安定江南的局势。但也表现出他对江南佛教文化的关注。

诗格清远，转似出世高人，真不可解”。不仅从杨素身份上看其诗风不可解，从其归属关陇集团而言，其“清远”诗风也不可解。

不过，从当时南北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此困扰评论家的问题则并非“真不可解”。杨素与南士交往过程中，其文风出现“南朝化”的倾向。具体就杨素之诗文风格变化过程而言，其受南朝文风影响有两个阶段：一是平陈之前，一是平陈之后。

平陈前，西魏、北周虽一度采取保守的文化政策，在文学上反对“竞为浮华”的现象，推行“大诰体”^①，但用行政方式干预文化问题往往不能收到预想的效果。此令影响所及仅有一二十年，且主要限于公文之类^②。当时关中最盛行的是以南朝亡人庾信、王褒等为代表的江左文风。《周书》卷四一《庾信传》载：

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学，信畴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卿士，多相请托。唯王褒颇与信相许，自余文人，莫有逮者。

《周书》卷一三载文帝子赵王宇文招曰：

幼聪颖，博涉群书，好属文。学庾信体，词多浮艳。

文学如此，书法亦如此。赵文深本为关中主要书法家，但南人之书风影响不断扩大，为北人效仿。《周书》卷四七《艺术·赵文深传》载：

及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惭恨，形于颜色。后知好尚难反，亦攻习褒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学步邯郸焉。

赵文深失落之极，以致自己“亦攻习（王）褒书”。关中文化风气之变化，于此可见。

庾信文体风靡一时，影响极大。隋初，文帝杨坚曾效仿宇文泰、苏绰的举措，整顿文风^③，但其太子杨勇、晋王杨广等皆习“庾信体”^④。杨素生长于周、隋之际，他当然会接触到“庾信体”，并潜心研习。这使他早就爱好江南文风，并欣赏真观法师之赋文。

平陈之后，杨素家中便有鲍亨、殷胄等文士为奴，通过他们取鉴江左文学艺术风格，显然是一条捷径。不仅如此，杨素以其特殊的地位，还有意识地与南士交往，以提高自己的声望^⑤。在与南人交往过程中，其对南朝文化之了解自然不断加深。由杨素招引诸位江南儒者修《魏书》^⑥，并奏请陆从典修通史，具可见出其对南朝文化的喜好之情。由上所考，在当时崇尚江左文化的时代环境中，杨素表现得特别突出，他对南朝文学艺术风格理解甚深，并与关陇集团昂扬奋发的地域精神相结合，写就了“一时之盛作”^⑦。

①《周书》卷二三《苏绰传》：“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

②《周书》卷四一《王褒庾信传论》已指出“（苏）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粃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矣焉。”

③ 详见《隋书》卷六六《李谔传》所载谔之奏文。

④《隋书》卷五八《魏澹传》载“废太子勇深礼之，屡加优锡，令注《庾信集》”；《柳传》载：“初，（晋）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己后，文体遂变。”

⑤ 隋文帝灭陈后，下令将江南有代表性的士族名士皆强行征召入关。然而，文帝在南人的安置上并不优遇，故不少南士仕宦无门、生活无着。当时，文帝诸子皆招集流散之江南人物，如太子杨勇之东宫、杨俊之秦王府、杨谅之汉王府便有不少南士，致力于著述作文，为诸王兴造舆论。当然，最突出的还是杨广之晋王江都府邸学士，其人数多达百余人。对此，拙文《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已有所考论。在权臣之中，开皇、仁寿年间，杨素是与南人交往最密切的。之所以如此，除了文化因素外，与杨素之政治野心恐也不无关系。他虽然没有像其子玄感那样明确要代隋，但仁寿、大业之交，杨素之权势、声望已引起了隋炀帝的严重猜疑，《隋书》本传称“时素贵宠日隆，其弟约、从父文思、弟文纪，及族父异，并尚书列卿。诸子无汗马之劳，位至柱国、刺史。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绮罗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亲戚故吏，布列清显，素之贵盛，近古未闻”。隋炀帝对素心怀猜忌，“外示殊礼，内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丧，因改封于楚，楚与隋同分，欲以此厌当之。素寝疾之日，帝每令名医诊候，赐以上药。然密间人医之，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极，不肯服药，亦不将慎，每语弟约曰：‘我岂须更活耶？’”杨素养名增望的一个重要方式便是与南士交往。

⑥ 这里的《魏书》，当指北魏，即拓跋魏。这是北朝史，非南人所熟识。杨素领衔主编此书，竟皆用南人，说明其对南朝文化极度崇尚的潜在心理。

⑦《隋书》卷五八本传载杨素与北地一流文学家薛道衡交好，曾作一首七百字的五言长诗赠之，“词气宏拔，风韵秀上，亦为一时之盛作。”由此可见其诗文之“词气”与“风韵”是融汇南北的。

二、有关杨玄感与南士交往之史实及考释

关于杨玄感与江南文士交往的情况，检得如下几则主要记载。

潘徽与杨玄感之交往。《隋书》卷七六《文学·潘徽传》记载：

杨玄感兄弟甚重之，数相来往。及玄感败，凡交关多罹其患。徽以玄感故人，为帝所不悦，有司希旨，出徽为西海郡威定县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陇西，发病卒。

潘徽是杨素的“故吏”，又为玄感兄弟所重。其与杨氏之关系，确实非同一般。由此可见，大业以后，杨素父子幕中所纳及其交往之南士，形成了炀帝之外的一个圈子。

褚亮与杨玄感。褚亮是杭州钱塘人，博通经史，曾与陆从典等人共同协助杨素修《魏书》，后依附杨玄感。《旧唐书》卷七二《褚亮传》：

大业中，授太常博士。时炀帝将改置宗庙，亮奏议。……议未行，亮坐与杨玄感有旧，左迁西海郡司户。时京兆郡博士潘徽亦以笔札为玄感所礼，降威定县主簿。当时寇盗纵横，六亲不能相保。亮与同行，至陇山，徽遇病终，亮亲加棺敛，瘞之路侧，慨然伤怀，遂题诗于陇树，好事者皆传写讽诵，信宿遍于京邑焉。

由此可知，褚亮与潘徽经历相似，即早先为杨素所礼遇，素死后，杨玄感利用故旧之谊，继续与他们来往。二人游离出炀帝的御用文人圈子，最终因杨玄感之败而遭迫害。

虞绰与杨玄感。《隋书》卷七六《文学·虞绰传》载：

虞绰字士裕，会稽余姚人也。……绰身长八尺，姿仪甚伟，博学有俊才，尤工草隶。……及陈亡，晋王广引为学士。大业初，转为秘书学士，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绰所笔削，帝未尝不称善，而官竟不迁。初为校书郎，以藩邸左右，加宣惠尉。迁著作佐郎，与虞世南、庾自直、蔡元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侍诏，恩盼隆洽。……绰恃才任气，无所降下。著作郎诸葛颖以学业幸于帝，绰每轻侮之，由是有隙。帝尝问绰于颖，颖曰：“虞绰，粗人也。”帝领之。时礼部尚书杨玄感称为贵倨，虚襟礼之，与结布衣之友。绰数从之游。其族人虞世南诫之曰：“上性猜忌，而君过厚玄感。若与绝交者，帝知改悔，可以无咎；不然，终当见祸。”绰不从。又有告绰以禁内兵书借玄感，帝甚衔之。及玄感败后，籍没其家，妓妾并入宫。帝因问之，玄感平时时与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绰对。帝令大理卿郑善果穷治其事，绰曰：“羁旅薄游，与玄感文酒谈款，实无他谋。”帝怒不解，徙绰归东。绰至长安而亡，吏逮之急，于是潜渡江，变姓名，自称吴卓。游东阳，抵信安今天水牟大德。大德舍之。岁余，绰与人争田相讼，因有识绰者而告之，竟为吏所执，坐斩江都，时年五十四。

由这一记载，可知杨玄感设法争取与江南才士交结，所谓玄感虽“称为贵倨”，但对绰则“虚襟礼之，与结布衣之友”，谦恭如此，目的在于提高自己的名望。虞绰则因在炀帝跟前失宠，故与玄感往来。其交往形式则是“文酒谈款”，即饮酒、作文与谈论。也可见出杨玄感对南方文化的兴趣。

王胄与杨玄感。《隋书》卷七六《文学·王胄传》载胄琅邪临沂人，为江东门望最显赫的侨姓士族之后代，早以才华出众显名。关于他入隋及与杨玄感交往的大概情况，其本传载：

及陈灭，晋王广引为学士。……大业初，为著作佐郎，以文词为炀帝所重。……帝所有篇什，多令继和。与虞绰齐名，同志友善，于时后进之士咸以二人为准的。……胄性疏率不伦，自恃才大，郁郁于薄宦，每负气陵傲，忽略时人。为诸葛颖所嫉，屡譖之于帝，帝爱其才而不罪。礼部尚书杨玄感虚襟与交，数游其第。及玄感败，与虞绰俱徙边。胄遂亡匿，潜还江左，为吏所捕，坐诛，时年五十六。

王胄的经历与虞绰非常相似。因受到诸葛颖的中伤，不为炀帝所宠，杨玄感则乘机“虚襟与交，数游其第”。杨玄感败后，因此受到诛杀。

杨玄感积极主动地与南士交往，甚至与隋炀帝争夺江南才俊，形成了炀帝宫廷之外的一个南人交际圈。与之游走的南士，其中有其父的旧人，也有他新结识的新友。以上所列几位，如虞绰、王胄为江东侨、士

士族子弟，与潘徽同为炀帝征引之藩邸学士，褚亮也为大业初炀帝所授之太学博士，都是文人学者。杨玄感公然与诸位南士密切来往，其用意何在呢？

当然，应该考虑其中的文化因素。杨玄感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无论是家学，还是师传，都有南朝文化的基因。关于家学，杨素对江左文化的钦羡自然会影响到其子弟。至于师传，据《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徐文远传》，文远本为南人，“江陵陷，被虏长安”，为博学多通的大儒，“文远方正，有儒者风。窦威、杨玄感、李密皆从其受学”。玄感从徐文远受学，难免受到江南学风的熏染。玄感与南士往来，也涉及文学方面的内容。上文所引虞绰之言便说“与玄感文酒谈款，实无他谋”。

不过，这只是一方面。必须指出，促使杨玄感交结南士的主要因素恐怕不在文化方面，而主要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

我们知道，由于杨素兄弟的活动，其家族在文帝后期便已成为当时仅次于皇室的豪门，权势极大。这必然引起了隋炀帝杨广的嫉恨，并会采取了一些抑制措施。炀帝当政不久，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仅杨素之死与此有关，而且炀帝始终对杨玄感兄弟予以压制。《隋书》卷七八《艺术·萧吉传》载：

及炀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开府。尝行经华阴，见杨素冢上有白气属天，密言于帝。帝问其故，吉曰：“其候素家当有兵祸，灭门之象。改葬者，应可免乎！”帝后从客谓杨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为吉祥，托以辽东未灭，不遵私门之事。

对此，杨玄感兄弟自然心怀怨恨，曾有阴谋刺杀炀帝的打算。《隋书·杨玄感传》载：

自以累世尊显，有盛名于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将吏，复见朝纲渐紊，帝又猜忌日甚，内不自安，遂与诸弟潜谋废帝，立秦王浩。及从征吐谷浑，还至大斗拔谷，时从官狼狈，玄感欲袭击行宫。其叔慎谓玄感曰：“士心尚一，国未有衅，不可图也。”玄感乃止。

可见杨玄感早有反隋之心，惟惧“士心尚一，国未有衅”而作罢。但随着炀帝逐渐疏离关陇集团，并因东征高丽及奢靡，弄得人心惶惶，“天下思乱”，杨玄感于大业九年（613年）乘机发动黎阳之变。

杨玄感在准备叛乱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手段便是交结各方面人士，以打破炀帝“士心尚一”的局面。《隋书》本传便载玄感“性虽骄傲，而爱重文学，四海知名之士多趋其门”。特别是作为炀帝藩邸旧人的虞绰、王胄、潘徽等人，主要在于玄感之主动招引。如对虞绰“虚襟礼之，与结布衣之友”，对王胄也“虚襟与交，数游其第”，便是典型。作为隋代关陇权势集团的贵公子，杨玄感一贯傲慢无礼，但与隋炀帝争夺南士却如此殷勤，其中的政治图谋是很明显的。

仔细检点史籍，与杨玄感交好之南士绝不止上述几位。《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大业九年载玄感黎阳变起，“韩擒虎子世谔、观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来护儿子渊、裴蕴子爽、大理卿郑善果子俨、周罗睺子仲等四十余人皆降于玄感，玄感悉以亲重要任委之”。其中虞世基、裴蕴是炀帝决策层的核心人物，皆为南人；来护儿、周罗睺也是炀帝崇信的南方武将，诸人之子关键时刻依于杨玄感，恐非一时冲动，其间或深或浅，当早有交结。正由于杨玄感与南士交往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从而引起了隋炀帝的忌恨，最终在平定杨玄感之乱后，“穷治其事”，并将诸人皆加流放和诛戮。

从与杨玄感相交之江南人士的角度看，他们既为炀帝之藩邸旧人，或为其亲信大臣子弟，深知炀帝“性多忌刻”^①，为何要冒险“过厚玄感”呢？仔细思量，这是由当时南人的处境与地位所决定的。隋朝灭陈，南士入北，沦为“亡国之余”，丧失了他们固有的社会地位与政治特权，成为关陇军政集团肌体上的寄生物，主要凭借其文学才能，以仰仗隋统治者的赏识和提携。比如隋炀帝自任扬州总管坐镇江都开始，便大力笼络南士，而其晋王府邸的南士大多充当了文学侍从的角色，即便是炀帝宠信的江南权臣虞世基、裴蕴等也有如佞幸。对隋唐之际江南士人的处境及其心态，唐长孺先生曾经指出：

东晋南朝以来，北人就以江南为文物衣冠的正统所在，北朝末年以及隋初唐初，崇尚南朝文化蔚为风气，这使得江南旧门阀中的一部分人得以在隋唐之际以家学文才支撑门户，依附并挤入关中勋贵集团核心。对于早就开始没落并先后脱离自己宗族乡里的南朝侨士士族来说，依凭文学

^①《隋书》卷七八《艺术·庾季才传附子质传》。前引《隋书》卷七六《文学·虞绰传》载虞世南谓绰言“帝性猜忌”，劝其疏远杨玄感。这表明南人对炀帝的个性是很了解的。

进身的道路是他们在北方政权中获得并保持政治地位的唯一可行的道路，这条道路也是以后山东士族将要走的道路。科举制实际上就是这样一条进身道路的制度化。^①

作为文学侍从与佞幸，南士的地位是不稳固的。王胄、虞绰便因遭人嫉恨，仕途不畅，并为炀帝所冷落，从而与杨玄感交结，以寻求新的靠山。至于虞世基、裴蕴诸人之子在黎阳之变的关键时刻依附杨玄感，则是看到炀帝统治的危机和玄感变乱成功的可能性，也是一种政治投机行为。可悲的是，这些丧失了政治根基的江南人物，尽管他们努力寻求政治庇护，但无论忠于隋炀帝，还是暗通杨玄感，最终都不可避免地沦为他们之间权力争夺的牺牲品。

由上所考，可见在隋朝灭陈，南士北徙的历史背景下，隋朝廷与诸王府大量安置与招集江左名士，推动了南学北输与南北文化交流的进程，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在这一过程中，杨素、杨玄感父子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权势之家，也用心交结、网罗江南士人。究其动机与影响，既关乎杨素父子的文化喜尚，也关乎其政治图谋。相较之下，杨素更多的是出于对江左文化的钦羡而交结南士，而杨玄感则主要出于政治目的，借南士以提高声望。故前者得到炀帝的宽容，后者则为炀帝所猜忌。而从南士的角度看，作为“亡国之余”，他们投依权门，主要是想在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夹缝中，寻求靠山罢了。^②

（责任编辑：张叔宁）

The Social Contact of Yangsu with His Son and the River Left Scholars —A One-sided View of the Culture of the River South in the Sui Dynasty Spreading to the North

Wang Yongping

Abstract: Yangsu and his son Yang Xuangan were representatives as Guan-long nobles in the Sui Dynasty. After the downfall of the Chen Dynasty, the south scholars moved to the north. Yang and his son attracted and contacted the south persons, exerting some influence on the exchange of north and south.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Yangsu admired the river left culture and his writing style was obviously influenced by the southerners. Yang Xuangan contacted with the southerners mainly from the needs of politics. So he was hated by Sui Yang Emperor. Many south scholars depended on the Yang and his son and wanted to seek new political backers, but were eventually punished by Emperor Yang severely.

Key words: Yangsu; Yang Xuangan; Emperor Sui Yang; the river left scholars; cultural exchange

① 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第373页。

② 从根本上说，作为关陇集团的主要代表人物，杨素、杨玄感父子对江左文士的礼遇，与隋炀帝优待南士一样，是出于对南朝文化的钦羡心理。此后，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初统治者也有大致相同的心理和举措。对此，清代经学史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第七篇《经学统一时代》中指出：“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归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也。……案史于隋一代经学盛衰及南北学统一，说皆明晰；而北学所以并入于南之故，尚未瞭然。南朝衣冠礼乐，文采风流，北人常称羨之。……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善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故虽以亡国之余，足以转移一时风气，使北人舍旧而从之。”因此，他进一步断言：“经学统一之后，有南学，无北学。南学北学，以所学之宗主分之，非以其人之居址分之也。”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三章《北朝文人乐府》结语中指出北朝文人乐府为中原汉人或江南入北文人所作，“严格而论，实无异南朝乐府之副产品。在政治上，北朝统一南朝，在文学上，则南朝统一北朝。”自南北朝后期以来，北人崇尚江左文化若此，隋唐之际，关陇统治集团招聚南士之深因亦在于此。本文所考杨素、杨玄感父子的具体史实，则为理解这一时代背景提供了事例。